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组织模式研究

韩洁, 陈兆亨, 王量量, 庄婕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文章通过社会资本分析, 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社会资本效用进行实证研究。首先, 验证了部分社会资本因子对传统村落文旅从业者的收入增长有显著影响; 其次, 文章选取了三个典型传统村落, 分析不同文旅融合项目的组织模式, 并在理论层面阐述不同组织模式对社会资本变化的影响; 最后, 归纳得出, 旅游开发应重视传统村落社会资本的培育, 并提出文旅融合项目组织模式的完善方向。

关键词: 社会资本; 传统村落; 文旅融合; 组织模式; 开发模式

[中图分类号] TU982

[文献标识码] B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Pattern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Han Jie, Chen Zhaozheng, Wang Liangliang, Zhuang Ji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ocial capital utility in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Firstly,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some factors in soci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cultural tourism practitioners. Secondly, the paper selects three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pattern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elaborat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tructural patterns on the changes in social capital in theory.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improvement mechanis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al pattern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explore the promotion value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structural pattern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突飞猛进的城镇化进程, 我国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严重, 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近年来,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组织模式逐渐成为推进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传统村落开展文化旅游是城乡供需双方互动的结果, 极大地促进了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农民返乡创业、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在整体上,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模式正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其中村落内部社会网络断裂、社区参与不足与村民地位边缘化等社会问题较为突出, 严重制约着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许多传统村落都尝试通过文旅融合实现发展, 但由于理论探讨和方法研究有待更深入的展开方能指导实践, 尤其是对文旅融合组织模式缺乏分析, 导致照搬样本现象的产生。鉴于此, 本文力图通过对案例乡村旅游模式的实证研究, 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组织模式的构建提供一些借鉴。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2018R0090)。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17J05089)。

作者简介: 韩洁(1979-), 女, 博士, 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 城市风貌保护、城市遗产保护与更新设计、社区营造。

通讯作者: 王量量(1978-),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城市设计、乡村营建, 邮箱: leonwang@xmu.edu.cn。

1 研究背景

1.1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目组织模式概述

总体而言, 国内学者在文旅融合项目组织模式的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 可基于体验内容、资源依托、动力机制、投资主体、经营管理方式、组织形式等进行分类^[1-3]。此外, 依据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石培基等将开发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成长型”^[4]。他认为政府主导的模式对农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起到了重要驱动作用, 而市场主导模式常见于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地区, 民间组织完备、行业高度自律往往是重要条件。郑群明等将乡村旅游的组织模式分为“公司+农户”“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农户+农户”3种模式^[5]。

总体上看, 目前基于乡村和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项目组织模式研究定性描述较多, 定量分析较少; 横向、静态的模式对比较多, 纵向、动态地揭示组织模式影响的较少; 从经济管理的角度研究文旅发展组织模式的较多, 从社会层面研究参与结构的较少。本文尝试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框架, 选择发展动力机制这一与经济利益紧密关联的分类方法, 对各模式下的旅游开发绩效进行动态、深入的研究。

1.2 社会资本概念及其在传统村落发展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布迪厄(Bourdieu)提出的, 并在科尔曼(Coleman)、林南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步理论化并

受到学界关注。他们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集中在个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可以获得并作为资源投入特定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6]。普特南(Putnam)将社会资本上升为社会或社区的群体属性,是决定地方政府治理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并将其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7]。总的来看,社会资本理论发展日趋完善,已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乡村治理等方面也有丰厚的成果。胡荣提出社会资本中的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自主参与产生了影响^[8];周生春等证实乡村社会中信任、规范及拓展的社会网络对村民的集体行动有重要影响^[9];唐为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程度与和谐程度等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10]。然而,乡村旅游作为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增长极,涉及乡村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经济发展效益等多方面问题,目前学界却较少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进行研究,这一领域的空白亟须填补。

2 社会资本对乡村旅游开发绩效的影响

2.1 研究框架与数据来源

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是影响乡村旅游开发绩效的重要因素(见图1)。从传统村落的角度,本文将探讨社会资本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深化为如下几个问题:①社会资本是否会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起作用?②在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下社会资本的作用程度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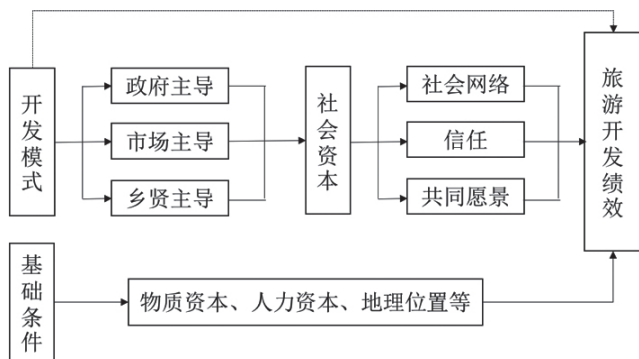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模式研究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本项研究于2018年5月至8月进行,采用入户问卷调查、半结构性访谈的方法,分别于龙岩市培田村发放49份、婺源县篁岭村发放51份、厦门市顶村村发放30份,共计13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17份。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村落,是由于它们均以传统村落旅游为主导产业,并分别代表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合作社主导三种开发模式,地理位置上均位于山区,避免了地理区位因素干扰。在调查过程中,考虑到访问对象需要对家庭情况有准确的了解,故调查对象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在性别上,男性占69.2%,女性占30.8%;在年龄结构上,18~35岁人群占比36.8%,36~55岁人群占比49.6%,56岁及以上人群占比13.6%。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实证结果分析。

2.2 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已被广泛使用的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Delta HI = \alpha_0 + \beta_1 SC + \beta_2 PC + \beta_3 HC + \varepsilon_0 \quad (1)$$

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村民是传统村落的主体,村民能否从传统村落旅游中获益及获益的多少能够最切实地反映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效益,故本文以传统村落旅游从业者家庭近五年的收入增长量作为因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PC为物质资本,选择了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这一指标;HC为人力资本,选择了个人受教育程度(年)及是否为党员(虚拟变量)两个指标。

在社会资本指标的选取上,由于社会资本的概念不尽一致,目前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尚未得出一致认可的指标。参考普特南(Putnam)的定义,并结合文献资料与传统村落旅游的背景,笔者选择了社会网络、信任、互惠性规范三个维度。首先,在社会网络这一维度上,根据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嵌入性”理论,经济活动是在社会网络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11]。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网络规模效应越大,系统整合的效力越强^[12]。村集体能否摄取各类型的资源,并将其嵌入原有的社会网络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效益。其次,在高度信任的社会中,自发性的社会交往发达,有利于培养有高度向心力的组织,而不必以政府力量为必须途径^[13]。信任促进了交易行为的发生,降低了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促成了民间的合作行为。在互惠性规范上,在传统村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他行为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种理性的预期,即自身的付出能够在未来获得相应或更多的回报。这种规范并非法律强制保障实施的,相反它是道德的,由一系列利益举动构成。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笔者按李克特五级评分法将答案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非常同意”五个等级,并按1~5分赋值。考虑到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村落内部社会资本,为反映这一变化,本研究不同于以往对社会资本的存量进行测量,而是尝试将其视为一种增量(见表1)。

2.3 回归结果

在人力资本方面,是否参加党派对家庭旅游收入增长未有显著影响(见表2)。在受教育程度上,旅游收入增长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未受过教育的村民五年来旅游收入平均增长2.36万元,小学学历2.51万元,初中学历3.33万元,高中学学历3.95万元,大学专科学历4.21万元,本科学历4.94万元。总体上旅游收入增长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笔者认为二者关系的不显著或许是进行回归分析的样本量较小的缘故。在物质资本方面,生产性固定资产这一因子在1%的水平上显著,一个标准差的增加可提高约0.15万元的收入增长。

在信任维度的社会资本上,表2的(1)和(3)列表明村民对游客和外来经营者的信任感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其收入增长。随着传统村落旅游业的发展,村民越发意识到吸引外来资源的重要性,主动与外界培育互信以增加合作机会,如村民引入外来资本合办旅游项目、与游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与高校机构合作开发旅游产品等。不同于以

表 1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

VARIABLES	变量解释	N	mean	sd	min	max
ΔHI	家庭近五年收入增长量(万元)	117	3.62	2.60	0.30	15.00
信任(SC1)	—	—	—	—	—	—
OUTSIDER	对游客的信任增量	117	3.74	0.73	1	5
VILLAGER	对本村人的信任增量	117	3.50	0.94	1	5
MERCHANT	对外来经营者的信任增量	117	3.24	0.77	1	5
社会网络(SC2)	—	—	—	—	—	—
GOV	与村两委的合作程度增量	117	2.89	1.18	1	5
COOPERATIVE	与合作社的合作程度增量	117	3.31	1.11	1	5
MERCHANT	与外来经营者的合作程度增量	117	3.33	1.06	1	5
互惠性规范(SC3)	—	—	—	—	—	—
FESTIVAL	参与节日庆典频次增量	117	3.63	0.97	1	5
CHARITY	参与公益活动频次增量	117	3.52	0.83	1	5
HELP	邻里互助频次增量	117	3.79	0.81	1	5
物质资本(PC)	—	—	—	—	—	—
PA	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万元)	117	11.36	15.20	0.00	100.00
人力资本(HC)	—	—	—	—	—	—
EDU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117	10.44	3.51	0	16
PARTY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	117	0.15	0.35	0	1

表 2 传统村落旅游从业者家庭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8)	(9)
信任	OUTSIDER	0.385** (0.012)	—	—	—	—	—	—	—
	VILLAGER	—	0.124 (0.309)	—	—	—	—	—	—
	MERCHANT	—	—	0.264* (0.073)	—	—	—	—	—
社会网络	GOV	—	—	—	0.225** (0.027)	—	—	—	—
	COOPERATIVE	—	—	—	—	0.317*** (0.002)	—	—	—
	MERCHANT	—	—	—	—	—	0.136** (0.021)	—	—
互惠规范	FESTIVAL	—	—	—	—	—	—	0.195* (0.088)	—
	CHARITY	—	—	—	—	—	—	—	0.158 (0.244)
	HELP	—	—	—	—	—	—	—	0.068 (0.623)
	PA	0.148*** (0.000)	0.151*** (0.000)	0.151*** (0.000)	0.148*** (0.000)	0.146*** (0.000)	0.152*** (0.000)	0.152*** (0.000)	0.153*** (0.000)
	EDU	0.000 (0.980)	0.004 (0.905)	-0.005 (0.868)	-0.011 (0.739)	0.004 (0.897)	-0.002 (0.943)	0.000 (0.993)	0.003 (0.922)
	PARTY	-0.045 (0.885)	-0.044 (0.891)	-0.101 (0.75)	-0.155 (0.624)	-0.206 (0.505)	-0.096 (0.763)	-0.067 (0.832)	-0.102 (0.749)
	a	0.513 (0.404)	1.435*** (0.006)	1.124** (0.03)	1.418*** (0.000)	0.904** (0.040)	1.484*** (0.001)	1.244** (0.012)	1.326** (0.016)
	F	128.225*** (0.000)	121.064*** (0.000)	123.996*** (0.000)	126.335*** (0.000)	132.749*** (0.000)	121.812*** (0.000)	123.182*** (0.000)	121.493*** (0.000)
	R2	0.814	0.805	0.809	0.812	0.82	0.806	0.808	0.806

往研究所证明的村级信任水平对村民收入有显著影响^[10],表2的(2)列表明在旅游开发中,村民之间信任感的变化并未对收入增长带来影响。这一结论间接说明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重构了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传统村落资源配置的逻辑已逐渐改变,由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向着由亲缘、地缘与业缘三者共同决定的格局迈进。

在社会网络这一维度,表2的(4)列表明村民与村两委、村集体与上级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有益于收入增长。现阶段,政府部门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嵌入”传统村落社

会资本中,在公共服务资金划拨、用地审批、旅游项目审批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表2的(5)列表明村民更多地参与合作社等村民内部商业组织,能够对收入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合作社的成立旨在提升旅游开发中的集体行动水平,进而做大“蛋糕”,红利由社员共享,限制了不合作者的“搭便车”行为,避免了旅游开发的外溢。表2的(6)列表明村民与外来商户的合作有益于收入增长。

在互惠规范这一维度,表2的(7)列表明村民参加节庆活动频次变化与其收入变化关系显著。节日庆典带有强

烈的地缘特征,体现了村落共同的信仰、道德与价值观,这种非正式性规范有利于提高村民间的合作效率。在公益活动方面,表2的(8)列表明这一指标不显著,原因是目前传统村落内公益活动普遍较少,普惠性的互助在农村地区尚处于初始阶段,村民更倾向于熟人之间的帮扶。表2的(9)列表明互助水平系数不显著,由表1可以看出,旅游开发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村民之间的互助水平,在现实中,村民之间也往往产生自发性的互助,以形成资源互补,实现共赢,导致这一变量的平均值较高、标准差较小,而村民的收入差异取决于其他因素,与互助水平无关。

3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组织模式对社会资本影响的路径

3.1 基于推动主体划分的文旅融合组织模式介绍

3.1.1 培田村:“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的组织模式

培田村位于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村内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部门(县、乡、村两委等)始终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统筹了古建修缮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景区运营管理等一系列流程,解决了集体行动水平低下下的困境(见图2)。具体来说,政府部门自2000年以来陆续投入2亿元用于前期项目启动,将村落划设为景区,并由县旅游开发局进行统一管理。与大部分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案例类似,为保护古民居,县政府于2005年批准了一块在古村旁的用地,用于腾挪古村内部分村民。村两委通过竞价方式拟定搬迁业主名单,所获款项用于支付田地征收成本,房屋建设成本由搬迁村民自付,导致部分经济实力较差的村民留在古村内。在经营模式上,培田村旅游业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年均250万元的门票收入,其中四分之一分红给拥有保护建筑的农户,其余部分划为财政收入。近年来培田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进程放缓,村两委亦表态希望村民能够在旅游开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却难以得到有效调动。总结这一模式我们不难

看出,依靠大量的财政投入,仅能通过“输血”解决前期项目启动问题,却难以长期持续地为旅游开发“造血”。

3.1.2 篁岭村:“市场主导”的文旅融合组织模式

篁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其市场化的旅游开发与运作模式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关注。在项目启动上,经过与县、镇两级政府商议,开发公司于2009年通过房屋产权整体置换,投资1200万元在篁岭村山脚下建设安置房与配套设施,使篁岭村村民进行整体搬迁。在2013年,公司以“招拍挂”形式获得了古村3.3万m²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古建修复、门票销售、商铺租赁、酒店运营等一系列商业活动。移居山下的村民则依托景区开发带来的客源经营起民宿、餐饮服务、交通客运服务,或供职于企业,吸引了部分当地村民返迁就业和兼业(见图3)。梳理这一模式,开发商将类似“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开发思路移植到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通过对居民房屋和土地的一次性补偿获得了集中统一的开发权,使得项目的建设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提高。

3.1.3 顶村村:“村民自组织主导”的文旅融合组织模式

顶村村位于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距离市区约40km。在项目启动上,顶村村于2008年与外资合作,共同投入4000万元用于休闲农业、酒店等旅游项目开发。为避免产品单一带来的同质化竞争,顶村村居民于2013年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对全村旅游资源统筹运营。在管理模式上,合作社理事会成员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对合作社运营、村集体资产管理、旅游项目开发负责,并受社员监督;社员以民宿形式“入股”或供职于合作社,服从理事会管理。在收益分配上,村民按入股房间数参与分红,利润的30%划为合作社集体资产,70%为社员分红收益,财务收支情况则每日在微信群上公布。每年年末,合作社运营净利润的40%返还村集体用于投资、村公益事业建设等,30%作为下一年度办公费用,其余作为奖励金、扶贫救济金等(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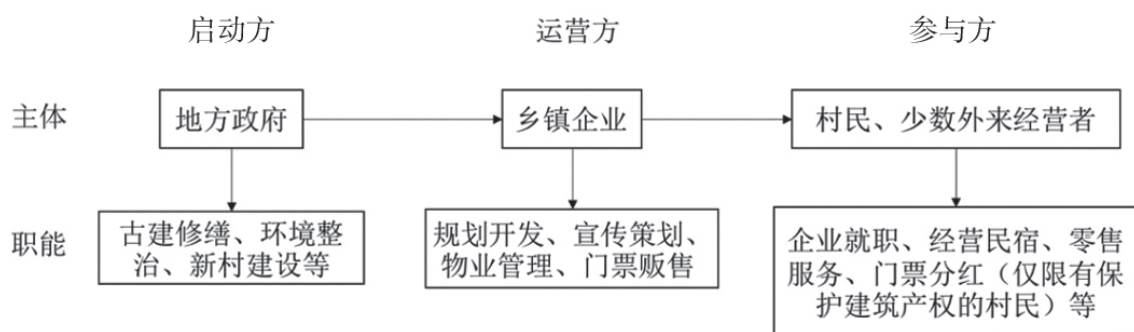


图2 政府主导下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组织模式 (以培田村为例)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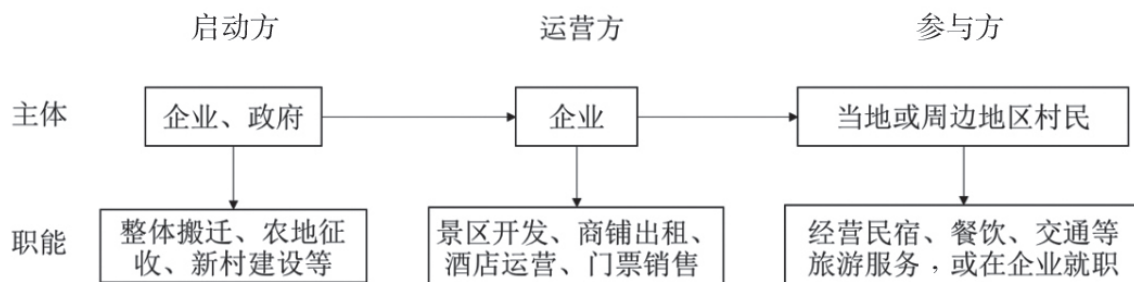


图3 市场主导下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组织模式 (以篁岭村为例)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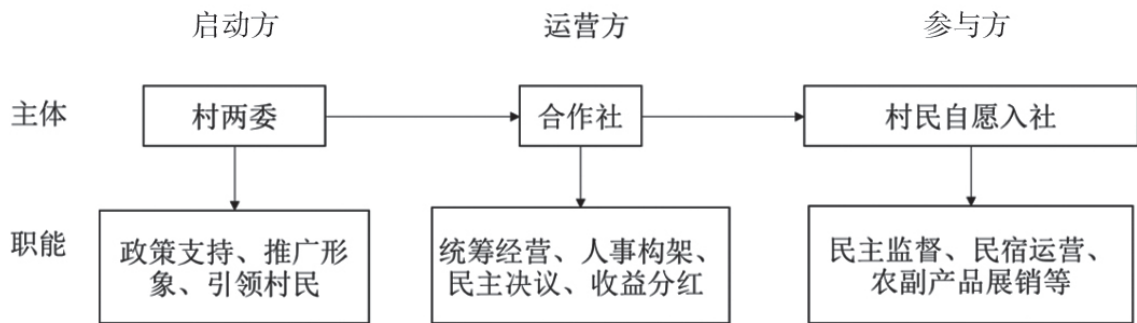


图4 村民自组织主导下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组织模式（以顶村村为例）（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4)。不难看出，在这一模式下，任何个人的投机行为，如财务造假、社员私自拉客等，都会损害整体利益，因此该模式得以长期运营的关键在于信息的透明、社员对规章的遵守及对违规者的惩罚。

3.2 各组织模式下的信任比较

一些研究证实，发达的社团组织（如宗教团体、商会）有助于信任的建立，因其提高了成员投机行为的成本^[13]，而寻租性的社团活动可能对信誉造成损害^[14]。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制约投机行为的制度设计有益于成员间信任感的提升。

以培田村和簪岭村为例，村民的信任感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增长得较慢（见表3）。经过问卷和实地走访调查，笔者认为培田村村民的低信任感主要源自以下几点：①政府主导下的旅游开发所获得的集体资金使用不明，村民难以发挥监督作用；②不合理的资源配置造成旅游资源与人力资源在空间上的不匹配，拉大贫富差距，村民对旅游开发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市场主导开发的簪岭村，村民的低信任感源自以下几点：①村民丧失旅游开发权，旅游产品难以向着多元化发展，造成村民内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②市场竞争扩大贫富差距。村内部分低收入群体由于缺少必要的资本，难以参与旅游开发，同时由于开发过程中的土地征收，其经济来源进一步减少。

表3 各组织模式下的传统村落社会资本增量变化

VARIABLES		培田村	簪岭村	顶村村
信任	OUTSIDER	0.65	0.70	1.11
	VILLAGER	0.38	0.36	1.17
	MERCHANT	0.18	0.26	0.33
社会网络	GOV	-0.33	-0.16	0.67
	COOPERATIVE	0.20	0.06	1.28
	MERCHANT	0.24	0.36	0.50
互惠规范	FESTIVAL	0.78	0.44	0.78
	CHARITY	0.67	0.82	0.72
	HELP	0.73	0.78	1.06

注：数据在五点式问卷评分的基础上减去三分而得，以反映增减变化

反观村民自组织主导下的顶村村，村民的信任水平均有较高增长，主要得益于：①透明的资金管理与民主监督机制提高了机会主义行为成本。个人的投机行为将损害整体收益，因此监督与惩罚不单来自上级，更来自其他社员。正如韦伯所言，个人通过社团参与被印上“社会印章”，更促使“团体惩罚”提高投机成本^[15]。②统一管理避免了恶性竞争带来的相互不信任。③合作社组织者多以返乡青年为主，在前期项目启动上更易获得村民的信任，有利于促进合作行为。

3.3 各组织模式下的社会网络比较

根据上文的回归结论可知，村民更多地与外界合作，有益于促进旅游收入增长，因此如何促使外来社会网络与村庄内部社会网络相“嵌合”而产生高效合作，则是对旅游开发模式优劣的检验。由表3可知，培田村与簪岭村在与政府、合作社、外来经营者的合作上均表现出较低水平，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①旅游开发权不明确。由于村落被纳入保护范围，古村中村民的自主经营与开发均需得到上级部门的层层批准，产生了寻租空间，制约了村民的开发热情。②分配制度不合理。开发分红仅局限于少数拥有保护建筑的业主，其余村民没有得到激励，相较于合作，各自为政是这一模式下更为理性的选择。对于簪岭村而言，该村虽然引入了较为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却未能使其与当地村民建立起有效联系，其主要原因为：①由于产权置换，村民不再拥有开发景区内优质资源的权利（即旅游开发权），导致村民与外来资本之间多呈现出雇佣关系而非伙伴关系。②旅游产业链短且单一，村民内部缺乏合作基础。就顶村村而言，其在旅游开发中对产权的明晰使该村呈现出较高的合作水平，具体来说得益于：①保障开发权益归村集体所有。该村虽然在早期也引入了外来资本，但与簪岭村不同的是，顶村村采用了股份制形式保障开发权益，并始终坚持村集体保持一半以上的持股比。②采用政经分离模式。在运营过程中，村两委负责向上级政府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合作社负责争取市场资源，村民作为开发主体，三者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了各自在政策、资金、人力上的社会网络优势。

3.4 各组织模式下的互惠性规范比较

随着旅游开发带来村集体收入的增长，部分村庄逐渐具备了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能力。村庄通过提供节日庆典、公益救济等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公共服务水平降低的现实问题，提升了集体行动水平。然而在不同模式下，此类互惠性规范（或非物质性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供给规模、供给激励亦有所不同。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由于2002年“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提留和五项乡镇统筹）的取消，村级财政捉襟见肘，在负担起水利、道路、教育等基础设施开支后，几乎再难有盈余财力大规模组织公益救济活动。因此，在培田村与簪岭村，互惠性规范的供给多由村民自发组织或公益组织协助组织，往往规模小且形式多于实质。而在自组织主导的旅游开发中，互惠规范的供给有其必要

性,合作社的长期运营离不开村内长辈与村民的认可,合作社不仅承担着为社员创收的责任,还承担着为村内老年人与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服务的职责,这一制度性的激励促使顶村村将旅游开发收益反馈给村民,有益于传统村落整体凝聚力的建设(见表3)。

4 展望与建议

4.1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总结以上三个典型案例,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导向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往往既难以获得可观的回报,又对村民内部信任与合作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村落旅游应是一个长期运营的过程,发达国家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黄金时期多在传统村落建设完成之后,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素质已经到达一定程度^[6]。旅游开发应重视传统村落社会资本的培育,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福利救济等形式满足老年人与弱势群体的诉求,培养村民间的信任感与共同目标;村民的理解与认可是实现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4.2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模式的完善

由于传统村落的自身条件与所处地区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旅游开发模式的选择往往受客观条件制约,抛开实际情况空谈模式选择是没有意义的,但如何协调开发中政府、市场、村民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值得长期讨论的话题。当前仅靠政府和市场的推动难以解决旅游开发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而将旅游开发的权利放手给村民则有利于发挥其监督与参与作用,降低开发过程中在参与动员、组织管理上的交易成本。以自组织、政府、市场三方合作为导向,注重旅游开发中的村民参与和社会公平,建立透明、多元的机制将是我国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主要趋势。

5 总结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社会资本中信任、社会网络及互惠规范中的部分因子均有助于促进传统村落文旅从业者自身收入增长,证实社会资本在传统村落文旅开发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利益分配制度的透明,政府、市场、村民自组织三方有机协调的开发模式均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如提高村民参与积极性、增强村民间的互信、促进村民与外界的合作、提升集体行动水平等,进而从整体上提升旅游开发效益。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组织模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贪大求快、追求短期回报的组织模式往往会以损耗社会资本为代价,长期来看,其效果适得其反。唯有注重村民之间信任感的建设、培养村民的共同目标、切实解决村民生活困难、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

制,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才能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 [1] 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 [2] 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J].旅游学刊,2006(03):12-19.
- [3] 文军,魏美才.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秀水村为例[J].生态经济,2003(10):125-127.
- [4] 石培基,张胜武.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述评[J].开发研究,2007(04):104-107.
- [5] 郑群明,钟林生.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旅游学刊,2004(04):33-37.
- [6] Coleman, J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Putnam, Robert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8]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02):61-85+244.
- [9] 周生春,汪杰贵.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2(03):111-121.
- [10] 唐为,陆云航.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1(09):77-85.
- [11]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06):1360-1380.
- [12] 李景海,陈雪梅.社会资本视角的产业集聚根植性和主动性诠释[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0,30(06):38-45.
- [13] 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96.
- [14] Knack S,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1251-1288.
- [15]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
- [16] 乔杰,洪亮平.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J].城市规划学刊,2017(04):81-89.